

狐精故事在我国文言小说中的演变

张永隆

狐狸精故事是我国历代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同时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这类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演变。

狐的故事来源很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多处关于狐的记载。如《海外东经》载：青邱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而且据说这种狐只在天下太平时才出现，以显祥瑞。由于这是神话传说中的狐，有神异性是很自然的，不应同后世的“精怪”混为一谈。

在先秦典籍中，保存了不少民间寓言，其中也有狐的故事。如《战国策·楚策》中大家熟悉的“狐假虎威”就是一例。在这个故事中喻虎为昏暴的主子，喻狐为狡猾的奴才，显然是讽谏性寓言。用来作比的狐狸自然也不能同后世的“狐精”等同。但其中对狐狸智机狡诈的夸张描写，同后世狐精的主要性格特征却是一脉相承的。

秦汉以来，民间出现迷信狐的习俗，对狐产生一种敬畏而神化的心理状态。如考古发现汉砖上常有的九尾狐形象，陈胜威慑部众起义时令吴广夜间“篝火、狐鸣”的作法等，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和对这种心态的利用。

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有段关于夏禹娶狐的记载：“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曰：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缓缓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另据记载，女娇后生子曰启，为夏第二代君主。前面《山海经》中的九尾狐和这里的九尾白狐，都属于神话传说，但由于作者不同，写作时代各异，内容就有差别。前者着重神性的记述；后者增加了人性的描写，而且神性、狐性、人性三者结合。她不但能主动上门，自择佳偶，而且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很有点类似后世文言小说中狐精的味道。难怪《聊斋志异·青凤》中的老狐精自报家门时振振有词地说：“我涂山之苗裔也。”

二

六朝以来，社会动乱，佛道盛行，民间信狐之风进一步发展，狐精故事成了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晋干宝《搜神记》卷八的二十七则故事中，就有十则是讲狐精故事的。鲁迅先生辑录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也有不少精彩的狐精故事。下面列举几则为例：

陈留董逸少时，有邻女梁莹，年稚色艳，逸爱慕倾魂，貽椒献宝，莹亦纳而未获果。后逸邻人郑充在逸所宿，二更中，门前有扣掌声，充卧望之，亦识莹，语逸曰：“梁莹今来。”逸惊跃出迎，把臂入舍，遂与莹寝，莹仍求去，逸挽持不置，申款达旦。逸欲留之，云：“为汝蒸豚作食。”食竟去。逸起闭户施帐，莹因变形为狸，从梁上走去。

（南朝·祖冲之《述异记》）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曰：“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候有大邪气。”儿以白文，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逮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问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殓，勿令犬见我尸。”死于山阴。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

（东晋·刘敬叔《异苑》）

以上例文有一定的典型性，大体可以看出狐精故事在六朝的发展及其特点。一是这类故事在汉以前传说中，记载比较零散，故事多为片断，也很少形象描写；到六朝以后，记载就比较集中，故事比较完整，也有了一定的形象描写。二是六朝志怪中的这类故事仍然情节简单，叙述直朴，缺少性格刻画，而且基本上是崇人的反面形象，有的还宣扬佛道思想。三是后世文言小说中作为狐精形象的一些基本特点，如随机现化，能迷人；有灵异，能先知；有飘移本领，能摄物于千里之外；狡诈多疑，顽劣怕犬等等，在六朝的这类故事中已经大体具备了。所以可以说，这类故事在六朝以前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从六朝开始进入了初步发展的阶段。

三

唐宋以来，信狐之风更盛。唐人张鷟在《朝野僉载·狐神》中说：“初唐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时谚亦有“无狐魅，不成村”之说。

在唐代，由于各种文学艺术都比较注意从民间吸取营养；新兴的传奇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佛教教义的通俗宣讲相当普及；再加上当时迷信狐魅的社会影响，使唐人小说中的狐精故事，不论数量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宋初成书的《太平广记》，搜集汉晋至五代的野史、传记、小说家言共五百卷，其中狐精故事九卷，而较多的是唐代故事。如卷450的《田氏子》（出自唐牛肃《纪闻》），本身并不是正面写狐精，但从田家老苍头相信讹传，夜间行路疑神疑鬼，草木皆狐，以致造成误会，闹出笑话的情况，更可看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心态。卷451《僧晏通》（唐薛用弱《集异记》），着重描写狐精狡诈诡变的特征。它随机幻

化，或举鬣变人首，或擷花草木叶成锦衣，或化美女惑男子。卷453《李自良》（唐薛渔思《河东记》），主要写狐精的神异功能。狐精幻化的老道，为报李自良归还“天符”之情，竟迷惑李的上司、太原镇守使马燧等，使其在神志失控的状态下，极力向皇上推荐李，使李由一个亲军牙门将越级擢升太原节度使。卷454《计真》（唐张读《宣室志》），写人狐爱情，重点描写狐女美而贤的思想性格。她秀外慧中，知书明礼，竭尽全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直到生命垂危时仍情义绵绵，爱夫恋子，难断尘缘，是唐人志怪中少见的珍品。卷451《李潜》（唐戴孚《广异记》），写狐精身上狐性与人性互相矛盾的复杂思想心态。她化作美女惑男子，作了东平尉李潜的妻子，并生了儿子，自然说明她渴求人间夫妻恩爱和家庭幸福。但当她随夫返京途经故乡时，又留恋故土，留恋亲眷，留恋岩穴生活，执意不愿再离乡背井，以致被熏死在山洞之中。死后得知亲生儿被虐待，自己被李的续妻辱骂时，又狐鬼显灵，义正词严地申斥李氏夫妇的不义行径，说明她仍有着人的自尊和慈母的情怀。卷454《姚坤》（唐无名氏《传记》），写狐精报恩的故事。姚坤曾从猎人手中赎买放生过众多狐狸，所以当他自身遭难时，老狐精不仅救他性命，还将孙女许配给他以作报答。但恩情不等于爱情，最终又导致离异。狐女临行，途迂猎犬，遂挟犬目毙之而走，表现了她绝路求生、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

从以上，大体可见唐人志怪中狐精故事之一斑，同时也可大体看出比六朝这类故事之演进。唐志怪中的狐精故事，虽仍沿袭六朝同类故事写作之遗风，有不少荒诞离奇之情节，但总体看，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较为广阔，表现的主题也较为多样；思想内容有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问题，如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不平、恩怨相报、婚姻不幸、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开始出现了具有人性美的新型狐女形象，美丽、可爱、善良、多情，有划时代意义；较多地注意了形象描写，特别是人物思想性格的刻划。

唐代文言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是传奇小说。唐传奇与唐志怪的狐精故事相比，前者在思想艺术方面都有新的成就和特点。特别中唐传奇中的这类故事与六朝志怪中的相比，发展演进之迹更明。从思想内容讲，主要是增强了现实性。主题思想的社会意义明显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气压倒了虚幻的妖气；生活气息浓厚了，荒诞意味减少了。从艺术手法讲，主要是注意通过细节描写、心理刻划、人物对话等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和揭示性格特征。象沈既济的《任氏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的情节虽涉怪异，但并不虚妄，而是很有生活实感。狐精幻化的女主人翁任氏的思想性格，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我国劳动妇女先进思想和优秀品格的艺术概括。同以前和同期志怪中的狐精形象相比，有许多新特点和新高度。她虽幻化为绝仑美女，但并不贪图荣华富贵，卑弃世家贵公子韦某的追求而钟情于贫贱的郑生，没有势利眼和世俗偏见；她坚贞刚烈，正气凛然，使妄图凌辱她的韦某理屈束手；她勇敢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看中郑六就不顾及他的贫贱，就既不要父母之命，也不用媒妁之言，主动地表白爱情，热烈地追求欢乐；她精明能干，善于理财，表现出自己支配命运，自己争取美好生活的一种竞取精神；她讲交情，重信义，知恩相报，当初“暴不失节”，最后却“徇人以至死”。在她这些思想性格中，都放射着社会时代的光芒。其核心就是初步萌发的民主思想和人权观念。这与当时市民阶层的初步形成，显然有直接关系。《任氏传》在艺术手法方面，除了注意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形象之外，还比较注意运用各修辞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比如写任氏的美，就没有从正面描写，而是从侧面进行渲染和衬托。先

是韦某得知郑六得一丽人，便冷笑着说：你只配得个丑妇，哪有什么丽人！话虽如比说，但因他本性好色，心里仍放不下，就叫人去看究竟。回来说，果真是难得的丽人！韦不信，要他同相识的美女作比较。搬着指头说了一大串，回答都是比不上。最后搬出个“秣艳若神仙”，公认为最美的女子，还是说无法相提并论。韦才大惊道：“天下岂有斯人乎？”就这样，通过先反衬后正托，使读者对任氏之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从晚唐到宋代，国家分裂，政权不断更迭；异族入侵，社会长期动乱；战火连绵，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从而导致宗教迷信更为猖獗，神仙方士之说更为盛行。所以这段时期文言小说中之狐精故事，基本上是中唐以前这类故事之沿袭，但内容更加怪诞，文彩更为逊色。总的来说质量不高，成就不大，不必详加论述。

四

明清时代，民间信狐之风仍盛，特别我国北方农村，狐仙堂遍及各地，有所谓“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的说法。

明代文言小说中，虽也有狐精故事，而且题材比较广泛，但总的讲，也只在唐传奇和清文言小说狐精故事之间起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影响不大，无赘述之必要。

清代文言短篇小说数量宏富，专集不少，其中狐精故事也丰富多采，而成就最高者当推蒲松龄《聊斋志异》。它不仅集历代文言小说狐精之大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在同时同类作品的这类故事中，也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辉煌成就，除了社会时代背景的原因之外，主要是作者在出色继承和借鉴传说的基础上，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创造。

在写作形式和技巧方面的独创，首先是把志怪、志人、传奇三种手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人物描写。如前所述，六朝以来志怪中的这类故事，缺少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性格描写，大都看不出人性特征。唐传奇在这方面虽有突破，但富有创造者仍然较少。《聊斋》创造性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把文言小说史上这三种手法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塑造了一批比较完美、比较统一的狐精艺术形象。情节离奇，设想诡谲，是志怪特色；深刻有趣的对话和具体生动的描写是志人手法；委婉曲折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则是传奇特点。如对《张鸿渐》中的狐仙舜华，作者主要以志怪手法写她的神异性，以志人和传奇手法写她的狐性和人性，从而塑造了一个既幻化无穷，法术无边，具有神异性特点；又聪慧中有狡黠，机灵中有顽皮，多情中有狐媚，爱情婚姻问题上自作主张，自媒托身，具有狐性特征；同时更精明能干，有胆有识，独具慧眼，自尊自重，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血肉丰满，性格显明，充满人情味，具有人性特征的侠女形象。其次是作到了短小形式和饱满容量高度统一。不象六朝志怪中的狐精故事，篇幅虽然短小，但简单直朴，缺少内蕴。除本身的东西之外，经不起细细咀嚼和更深的挖掘。《聊斋》中的这类故事虽是短篇，但短而精，内容丰富，意味深长，绝大部分都有言外之意，有一定的新社会实现意义。或攻击社会时弊，或寄托人生理想，或给以生活教训，或赋予哲理启迪，读来大有玩味思考的余地。如《辛十四娘》中的狐女辛十四娘，由于她在鬼狐世界中贫贱的社会地位和低下的社会关系，决定她的命运、性格同现实社会中的一般女子没有两样。作者通过统治者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对她剥夺自由、伤害尊严、侮辱人格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婚姻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对我们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教育

和认识意义。但《婴宁》中的狐女婴宁却不同。如果说辛十四娘是封建礼教巨石之下的小草,扭曲变形,纤弱枯萎,完全失去了生命的光泽。那么婴宁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性格。她在鬼墓中由鬼母养大,在罕无人迹、与世隔绝的深山峡谷中生活。既没有封建闺训的污染,也没有世俗观念的熏陶。这就决定她的性格天真憨直,自由活泼,洁白得象素丝,活脱得象小鸟,纯净得象山泉,烂漫得象山花,莹彻得象碧玉。在黑暗而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看到这样的性格,就象严冬里见到了鲜花,沙漠中遇到了清泉,乌云里透出了阳光,给人以爽快、清新、明丽之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婴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归真反朴、保存着天然人性的崭新女性形象。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蕴,寄托着作者的追求和理想。虽然这种形象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出现的本身就有破天荒的意义,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启迪。

当然《聊斋》狐精故事最主要的创造性贡献,还是内容的现实主义。写精怪故事,却用现实主义手法,这在以前文言小说中是罕见的。六朝志怪很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唐传奇虽有用这种方法,但毕竟血肉单薄。而在《聊斋》以狐精为主人公的优秀作品中,作者凭着高度的文学才能和深厚的艺术修养,通过描写狐精的种种虚幻故事,十分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社会,艺术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大胆地表达了能引起当时人们共鸣的进步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内心要求。如在《凤仙》中,通过对狐女凤仙争强好胜思想性格的塑造,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日趋腐败的社会根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聊斋》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广度。凤仙既美丽、多情、有心计,又自尊自重,倔强好胜。大姐包办了她的婚姻,丈夫不求进取,麻木不仁,处境寒酸,受到岳父的奚落和冷迂;两个姐夫都是富商,衣冠阔绰,财大气粗,受到岳父的偏爱和逢迎。凤仙受不了这炎凉世态的刺激,咽不下这世俗、势利的窝囊气。她想方设法,竭尽全力鞭策、帮助自己的丈夫,要他努力求取功名,一心出人头地。同时她自己也为此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巨大牺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象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那样,如癫似狂地求功名,不仅是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利禄的引诱,社会、家族、家庭的巨大压力等,都是现实的存在。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要冲破这道道关口,的确是很难的。作者蒲松龄一生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经历科考坎坷,深知其中三昧,感受自然十分深切。所以他揭露封建科举弊中揭露封端不仅笔锋犀利,而且触及面比较深广。他比吴敬梓早半个世纪,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集建科举弊端的伟大作家。《聊斋》中众多的这类作品,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精品。

五

最后谈谈狐精故事的“继承”问题。

首先,狐精故事发展过程中的所谓继承,主要指的是故事形式和题材,而不是指内容和主题思想。因为即使承袭原有的形式和题材,如果处理不同,注入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现实意义不同,就会表现不同的主题思想。比如狐精作祟的凶宅故事,历代都有,就题材讲,当然有继承关系,但主题思想并不都相同。曹丕《列异传》的刘伯夷故事和《聊斋·狐嫁女》的殷天官故事,都讲他们不信邪、不怕魅,夜入凶宅,欲探究究竟。但前者讲诱杀狐魅,为民除害,充满恐怖感;后者写人狐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充满社会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主题思

杜诗“高者挂罥长林梢”句嚼字

沙 雁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高者挂罥长林梢”的“长”历来解释不一：很早以前，解为“长长的”居多数，至今同意这种解释者仍很多；前些年的中学五年制课本有可能莫衷一是，没作解释；此后的课本曾全注为——“〔长(cháng)〕这里是高大的意思”。这一“指”，又不无臆测的成分；还有人认为“长”与“林”应当结合成一个偏正式词语，但有可能是一个专用名词或代词。凡此种种，我觉得很有商榷的必要。

先说“长长的树林”这一解释。树林而又“长长”非同一般，既相当长又相当宽，决不是小片的丛林，也不会是狭长的林荫。杜甫那几间全仗朋友资助由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茅屋，座落在浣花溪边的村中。东面的万里桥和南面的百花潭都是村野；西面与北面亦然，只是多了些土路。其地虽有槐柳榆竹疏落间杂，而最大的地理特点是四围稻菽，满目平畴。若说方园数十里之内“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倒还实在，唯独没有，也不可能有“长长的树林”植根于方块田星罗棋布、阡陌与水渠纵横的土地之上。再说现行本把“长”解释为“高大”。自古以来，有用“茂”、“森”、“高”、“丛”、“深”、“寒”等等字眼修饰

想大相径庭。其次，继承不是简单体袭模仿，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发展和创新。前者犹如纸作的彩花，既不鲜艳，也无方香，更谈不上生命力，大都早被历史的岁月所湮灭。明清时代这样的志怪作品不少。后者由于在这些虚幻故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现实的社会意义，就使人感到不论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时代精神风貌的。象刚从山野中采摘的花朵，色彩斑斓，馨香扑鼻，露水滴滴，无比鲜嫩。《聊斋》中许多优秀的狐精故事就属这一类。此外，发展和创新并不全凭文人的努力。虽然作者的艺术才华，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加工和创造。特别狐精故事，大都最初就产生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他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骨血的结晶。后来经过文人搜集加工写作品，又回到人民群众中，由人民群众结合自己所处新时代的现实生活，结合各自时代群众不同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等，再度进行加工和创造。如此长期反复的结果使这些故事始终同人民生活保持着血肉难分的联系，始终不断地吸取新的空气和营养。犹如植物种子撒入沃土一样，经过群众长期不断地精心培育，不仅一代比一代更加根深叶茂，花香果甜，而且不断进行更高层次的新陈代谢，不断产生新的品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时代推移，狐精故事在思想艺术方面所显示的层次性高下的主要就是群众不断加工创造的历史过程的反映。

(1989年6月于青海大学)